



## 走向“超越权力”的“自我解放”

### ——反思霍洛威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念的重构

孙 亮

**摘 要:** 基于将“抵抗资本逻辑”细化为“行为抵抗抽象劳动”与“抽象劳动抵抗资本”两个层面,霍洛威批判了传统马克思主义过于重视后一种路径及其所倡导的劳工运动,但这一方向的实践导致了诸多的现实困境。在他看来,应该从“抽象劳动抵抗资本”转向围绕“行为”本身去寻求一种有尊严的裂缝式革命。但实质上,霍洛威所构想的革命理念要求废除资本的支配地位却又不触及对国家权力的反抗,本身是一个悖论,这不可能迎来自我确定(自决)的社会或共产主义社会。它表面上的激进,实质上遣散了左派的力量,走向一种新无政府主义。

**关键词:** 霍洛威; 马克思; 权力; 裂缝式革命

**中图分类号:** B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17)01-0045-09

霍洛威(John Holloway)作为“开放马克思主义”(Open Marxism)的开启者,因《无须夺权改变世界》(2002)、《裂缝资本主义》(2010)两本代表性的专著在西方学术界名声大噪<sup>①</sup>,招致柯林尼可斯、齐泽克等一大批当今激进左翼学者的往复辩难。不过,在汉语学术界,霍氏的观点既没有译介,也缺乏对其思想的评析,这显然与其在重构马克思政治哲学理念方面作出的诸多思想创见是不相称的。如此评判的根由在于,今天人们在阐释马克思思想特质的过程中过分依附资本逻辑批判,似乎所有的讨论最终将原因归结为“资本建构”便完成了解释世界的全部工作,进而对改变世界只能是一种“立场姿态”或者是“无限期的等待”,但现实亦然。与这个方向着力不同的是,当代西方激进左翼思潮中吁求重构“激进主体”正是试图打破此种僵局,但是“边缘群体”(墨菲)、“无份之份”(朗西埃)等一系列主体计划并未能够如愿以偿,反而困难重重。如果深入到学理深处来看,虽然激进左翼理论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在对待资本逻辑的态度上存在差异,但他们试图以寻求革命主体的方式,并在此基础之上重构权力的政治理念则是完全一致的,他们斗争目标所朝向的依然是权力。与上述思路完全不同,持有开放马克思主义信念的霍洛威秉持“权力与自由始终是二律背反的”这一“绝对命令”,通过剥离资本逻辑的内在结构,继而指认了其核心观念,即“所有朝向权力重构的解放路径都是错的”。毫无疑问,这是一条全新的重思马克思主义革命的方案。

#### 一、劳工运动的低潮与行为抵抗观念的兴起

“传统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建立在抽象劳动基础之上的劳工运动理论,但对于拜物教和

<sup>①</sup>前者被翻译为11种语言,后者则被翻译为10种语言,影响广泛。以亚洲的日文版为例,就在日语学术界引发了诸多讨论。霍洛威授权笔者译介其文章,其论著将进一步以中文呈现。

劳动二重性的问题却视而不见”<sup>①</sup>，我们理解霍洛威的思路也许从这个地方切入最为恰当。的确，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正是基于对抽象劳动的分析才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劳资关系，进而呈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者之间的对立关系。按照传统革命理念来讲，这需要通过无产阶级运动的方式以开启未来的全部图景。当霍洛威批判这种看法的时候我们需要反思：真的存在什么问题吗？再说，劳动的二重性不一直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的常识吗？为什么霍洛威会认为是视而不见呢？依他之见，这是由于在马克思主义传统内部存在着对资本主义危机的不同理解，诸如经济失衡、消费不足、过度积累等，可这些判断常常被引向一种技术性的、经济学术语上的危机概念。现在需要进一步厘清的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理解不仅表明建立另一种不同形式的社会组织的必要性，更展示了通过行为(Doing)改变世界的可能性<sup>②</sup>。这为重新理解资本主义的危机概念提供了契机。纠正上述危机理解的思路在于，“危机并非仅是经济层面的，只是它表现为经济，危机实质表达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结构的不稳定性”<sup>③</sup>。同时，基于拜物教思维的原因，传统马克思主义将改变资本主义的方向引向对“经济危机”这一“表现形式”的关注，以及随之导向的劳工运动，于是，这种思路对“表现形式”背后的“社会关系”视而不见，即遗忘了关注人的社会关系的危机。回顾《资本论》研究的历史经验，人们可以轻易看到，整个《资本论》被引向了对“统治人的生活的‘物’的研究、力量的研究(诸如货币、价值、租金、利润等)”，结果使得“经济学不可避免地将人抽象化了，以及将人作为社会变革的消极对象”<sup>④</sup>。理解到这一点也便能够明白，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劳工运动理论基础的经济危机的理解存在着重要的缺陷，那就是对生活的实质即人的社会关系发生危机的茫然与漠视。相应地，霍洛威借助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重新将“表现形式”与“实质”进行颠倒，必将带来对劳工运动的质疑以及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念的重构。

为了便于理解霍洛威强调的“人的社会关系危机”这一表述内涵，我们先看他提出的两种消解危机的方案，再逐步走向其内在逻辑的深处。霍洛威认为，在对抵抗经济危机这一传统思路的调整之后，我们必须对资本逻辑内在结构进行细化分析，相应地，可以看到存在两种不同的对抗资本逻辑的路径，“一种是用‘行为’反对它自己的抽象化，即反对抽象劳动；这是反抗劳动(Against labour)的斗争(因为此种劳动创造资本)，另一种是抽象劳动反对资本的斗争”，即反对劳动结果资本化的斗争，通常采取的斗争形式是劳工运动。当然，霍洛威要反对的正是后者，“当我们说反劳动的裂缝行为时实质上指的就是第一种运动，即反劳动抽象性的运动。更进一层则是反资本主义的运动，即反生产资本的劳动”<sup>⑤</sup>。毫无疑问，马克思革命理念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一直是指向后者的。

上述两种抵抗与他“行为”与“行果”(Done)的区分相关。高度重视《资本论》的霍洛威认为，原先我们的抵抗总是围绕着“行果”去思考如何能够消除由此积累的“资本”。在这里，霍洛威显然是对马克思活劳动与死劳动看法的重新搬用。我们知道，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就是物对人的统治，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sup>⑥</sup>，所以，抵抗就是要指向由死劳动(资本)及其生产资料私有制，并试图加以根除。霍洛威虽然也认为“资本建立在将人们过去劳动行为冻结成所有权这一基础之上，过去劳动行为是眼下行为的条件，过去劳动行为的冻结与挪用与来自于过去行为的当下行动的条件断裂了”<sup>⑦</sup>，但是，借助拜物教深入分析，他认为“马克思的拜物教术语是运用于描述‘行为’的断裂”<sup>⑧</sup>。处在拜物教视野中的人们只能看到“行果”，整个人的劳动行为都要以“行果”为规范来“教化”(黑格尔语)自身。这样一来，人们之间的关系，从表面上看，似乎都在“活雷锋式”的人人为他人生产，实则不过是要围绕抽象劳动这一交换法则的“社会关系的断裂”。基于此，我们可以讲，与传统马克思主义注重围绕“行果”寻求革

① HOLLOWAY J. Cracks and the Crisis of Abstract Labour. Antipode, 2010, 42(4): 917.

② BONEFELD W, GUNN R, PSYCHOPEDIS K. Open Marxism Vol. II: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Pluto Press, 1992: 146.

③ BONEFELD W, GUNN R, PSYCHOPEDIS K. Open Marxism Vol. II: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Pluto Press, 1992: 59.

④ BONEFELD W, GUNN R, PSYCHOPEDIS K. Open Marxism Vol. II: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Pluto Press, 1992: 160-161.

⑤ HOLLOWAY J. Cracks and the Crisis of Abstract Labour. Antipode, 2010, 42(4): 916.

⑥ 马克思. 资本论(1863—1865年手稿) 摘选//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8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469.

⑦ HOLLOWAY J. Change the World without Taking Power. London: Pluto Press, 2010: 30.

⑧ HOLLOWAY J. Change the World without Taking Power. London: Pluto Press, 2010: 43.

命的理念完全不同，霍洛威则转向重视行为本身。因为，正是将行为（人们的日常活动）转变为抽象劳动和剩余价值生产的劳动，以及将抽象劳动强加到人类全部生活行为之中，并使其成为行为的标准，第二层对抗关系才得以产生，人类活动才得以转变为价值生产的劳动，人们才被迫生产与劳动力相当的价值和用于资本增殖的剩余价值。所以，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解的革命理念的对象是以第一层对抗关系为前提的，只有明白这一点，才能理解马克思所说的，“整个革命运动的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sup>①</sup>。

虽然上述两种抵抗运动都旨在反对资本逻辑，但它们却具有不同的蕴意。至少在霍洛威看来，反资本运动（反“行果”）是受反抽象劳动（反对将“行为”抽象化）支配的。这也是说，只要具体劳动（“行为”）与抽象劳动之间的对抗依然存在，第二种剥削的对抗永远不可能被消除。这也是他指认当代西方激进左翼的一些学者与传统马克思主义革命理念最终失败的共同根由。因为，单纯重视上述第二种抵抗运动的结果最终产生了如下的现实难题：世界各地贸易联盟运动的衰落趋势、激进改革派的兴起，社会主义党派呈现出一幅下滑的迹象；苏维埃的倒台、东欧社会主义的相继易帜、拉丁美洲和非洲的民族自由解放运动也纷纷失败，资本逻辑已经席卷全球；人们的生活失去了对未来的期盼，到处充满不公以及陷入自暴自弃与无能为力的窘境之中<sup>②</sup>。对此，在他看来，反对资本的劳工运动或者说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路径，并没有给人类带来真正的改变，反而造成诸多政治灾难。所以，必须另起炉灶。从学理上讲，霍洛威是要告诫人们必须知道，资本逻辑批判在事实上被理解为对抽象劳动（“行果”）的批判是片面的，这种片面的批判依旧过于抽象，它未能真正厘清抽象劳动（“行果”）与具体或有用劳动（“行为”）之间的关系，也未能将人们的行为本身视为一种唤回生命的对抗形式，这一点应该对中国学术界目前流行的资本逻辑批判话语方式有一定的刺激作用，也值得我们反思。

在今天，即使依然到处都充满着反资本主义的口号，但在霍洛威看来，原有抵抗资本逻辑的方式已被现实无情地判定为失效了，那种围绕财产权斗争的整个道路是否值得死守应该重新反省。这一警告有着片面的深刻性，他逼迫那些整天呼唤资本逻辑批判的人们该思考一下具体实践指向的路径，否则，自身的批判真诚心将大打折扣。对待这种粗糙的资本逻辑批判及其产生的失败，霍洛威难能可贵地指明，所有的这些现状并非是马克思主义自身分析力量的失效，不过仅仅是建立在抽象劳动基础上的劳工运动，或者说只是在劳动反对资本意义上的失败而已。如今，人们必须深入细化资本逻辑批判，剔除这一条路径，转而重新启动反对劳动抽象化的“行为”这一被长期忽视的重要方向。依此，将可能重新拯救整个资本逻辑批判以及再次激活马克思主义政治理念。于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崭新领域便开显出来，在其中，人们依靠自己的“行为”砍断资本对社会的建构能力。由此可见，霍洛威的观点是要指明，解放任务的完成并非通过创造更大的劳工运动，而是通过人们行为进行成千上万次的断裂。在断裂的空间中，人们确信他们的创造力不会被资本所摧毁，他们将做那些他们自认为有价值的事情。这种对抗过程往往以内在对抗的形式出现，其旨趣是实现社会自我确认的创造性，组织形式通常被定性为反垂直性和参与性<sup>③</sup>。因而，我们不应将资本理解为一种经济范畴，而应该理解为人类活动机制中特定的历史形式，重新定位的革命路径必然是一种内在于资本（我们就在资本危机之中，并生产它），反抗资本（因我们反对那些霸权模式，反对资本以强调行动的重要性）和超越资本（因或许真的存在一个裂缝点以供我们创造一个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世界，如不停歇地运动，不停歇地处于危机的边缘）的行动<sup>④</sup>。

## 二、在裂缝中寻求尊严与超越权力的路径

由上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霍洛威对传统马克思主义革命理念重构或者阶级斗争转向的意图。

①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86.

② HOLLOWAY J. Cracks and the Crisis of Abstract Labour. Antipode, 2010, 42(4): 917.

③ HOLLOWAY J. Cracks and the Crisis of Abstract Labour. Antipode, 2010, 42(4): 918.

④ HOLLOWAY J. In, Against, and Beyond Capitalism. Oakland: PM Press. 2016: 50-53.

在他看来,人们日常行动过程中具有值得强调的情感和伦理的内涵。只要我们致力于把生命融入我们所欣悦或自认为重要的行动当中,这立即便是一种围绕“行为”(Doing)的抵抗,它旨在“反对并超越国家、代表、抽象劳动,反对并超越所有作为妨碍走向自我决定的拜物教形式,这样一种反对并超越必须总是经验的、疑问的、不确定的、非教条的、以及矛盾与不完整的”<sup>①</sup>。说得直白一点,就是要反对货币逻辑或资本需求,不过这一反对并非是一种劳工运动似的以革命的方式改造私有制本身,而是以自我满足和自我实现的方式去声张抵抗资本,致力于建构一个尤为正义的世界,这个正义的世界不再以利润的最大化为出发点,而是以对人类尊严的相互认同为基础。

困境在于,我们怎么超越统治人们的资本逻辑,进而去实施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拒斥资本主义,但是,我们每个“行为者必须工作以及生产价值,资本必须剥夺它们”<sup>②</sup>,这一观点还可以延伸为在资本逻辑下历史主体到底如何可能反抗?资本逻辑不是已经完成了包括日常世界的拜物教建构吗?霍洛威认为,从逻辑上看,似乎我们任何抵抗的“行为”都不可能存在了。不过,从现实层面看,这些表现得脆弱、短暂、困难和矛盾重重的抵抗碎片正在各种裂缝中成为可能。这是一种不同于资本逻辑的行为模式,它将防止我们在生活中对财富的物质利益过分地追求和渴望,这一行为之所以暗含“革命性”,在于它排除人类现存基础的破坏性逻辑,这一逻辑同时构成人类再生产的基础。

对于“行为”可能性的分析,在霍洛威那里,首先建立在第一个对应的策略性概念上,那就是呐喊。这是霍洛威借助阿多诺的“否定”概念的思想重构。他认为,虽然在马克思主义内部有着深厚的“否定”的思想传统,然而,因为特殊的历史进展以及马克思主义被教条化的理解之后,其“否定”的特质已经被消融殆尽了<sup>③</sup>。重提“否定”与上述“行为”紧密相连,就是要提醒人们在行动时要保持对资本逻辑“否定”的呐喊姿态。诸如,当我们写作或阅读时,很容易忘记起点不是为了造句而是改变生存处境的呐喊。面对由资本主义对人类生命的残害,面对现实世界如下的经验:一方面来自工厂的剥削、办公室的压力、人们遭受的饥饿、贫困或不公正、国家暴力或歧视的直接经验;另一方面有时它是来自电视、报纸或书籍中那些使我们愤怒的间接经验。假设我们面对镜头中数以百万计的儿童生活在世界各地街头流浪的时候,人们会自然地发出“一声沮丧的呐喊,一声恐惧的呐喊,一声愤怒的呐喊,一声拒绝的呐喊:不”<sup>④</sup>。

这种“不”吁求的是一种积极改变世界的姿态,“它是希望的呐喊,而不是绝望的呐喊。并且这种对未来的希望不是由神介入的救赎,而是一个积极的希望,一个我们可以改变一些东西(一声积极的拒绝的呐喊、一声指向实践的呐喊)的希望。因为,不指向实践的呐喊,仅仅依靠其自身的呐喊,依然是一声永恒绝望的呐喊,或者更为常见——一次无尽的愤世嫉俗的抱怨”,虽然这种怨气也可能影响政治,诸如,在英国脱欧过程中,民众的怨气显然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不过,这种怨气终究还是走向与自己生命价值的呐喊不同的方向,因为这种怨气“失去了它的否定力量并且像呐喊一样进入无限循环的自我肯定中。玩世不恭(我憎恨这个世界,但没有什么可以做)是失望的呐喊,是抑制其自我否定的呐喊”<sup>⑤</sup>。换句话说,对于我们每个身处资本逻辑所建构的社会关系中的人来讲,呐喊绝对不是对自身处境的发牢骚乃至等待自己消极的死亡,而是为人们梦想着解放自己而“否定”性地呐喊。那么,接着一个重要的问题就再次呈现,那就是“谁呐喊呢”?它需要将这种呐喊链接起来,组成一个反抗现有权力中心的组织吗?在《我们是谁》一文中,他认为,“我们是唯一的神,我们是唯一的创造者,至少对我们自己所处的社会来讲如此,我们是资本所依靠的财富的创造者”<sup>⑥</sup>。这样一来,谁在呐喊便很清楚,正是我们自己,而不是“他们”,更不是“通过构建一个政党、拿起武器或赢得选举”,这是他一再反对的,在《无须夺权改变世界》中,他专门叙述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我们将解放的思路盯在权力上,“那么我们将与历史上的其他强

① HOLLOWAY J. Change the World without Taking Power. London: Plutopress, 2010: 242.

② HOLLOWAY J. Change the World without Taking Power. London: Plutopress, 2010: 242.

③ HOLLOWAY J. Change the World without Taking Power. London: Plutopress, 2010: 8.

④ HOLLOWAY J. Change the World without Taking Power. London: Plutopress, 2010: 1.

⑤ HOLLOWAY J. Change the World without Taking Power. London: Plutopress, 2010: 22-23.

⑥ HOLLOWAY J. In, Against, and Beyond Capitalism. Oakland: PM Press, 2016: 77.

大的权力没有什么不同。所以，这不是出路，它无法打破权力循环”<sup>①</sup>。

相应上述思路的延续，霍洛威建立的第二个策略性概念是“遣散权力”。在他看来，这个时代已经不能再通过国家权力来改变世界了，无论理论上，还是一个多世纪现实夺权的革命经验都一再告诉我们，“革命概念与夺权紧密链接在一起，夺权改变世界的失败已经导致人们推断革命不再可能了”，“放弃梦想，放弃吧”已经走进了诸多人的内心<sup>②</sup>，霍洛威认为，必须切断夺权与革命之间的链接线，才有重新激活马克思主义革命观念的可能，方案只能是“放弃夺权”！放弃夺权？“如果我们不能通过国家来改变这个世界，那么，怎么办？国家仅仅是权力关系网络上的一个结点。但是，无论我们从哪里开始，我们不总是被卷入到这个权力关系网中吗？断裂真的能够被构想吗？我们不会被困在无休止的权力循环中吗？”<sup>③</sup>对此，霍洛威给出的方案过于乐观，也更为大胆。他认为，试图保持革命理念的唯一方式只能是“提高赌注”(Raising the stakes)。因为“传统的革命理念的问题也许不是目标太高，而是目标太低。夺取权位(Positions of power)的观念，无论是政府权力还是社会中更多的分散的权力，都忽略了一个问题，即革命的目的是要解除权力关系，建立一个人们的尊严得以相互承认的社会”。所以以往失败的是这样一种观念，即革命意味着夺取权力然后再废除权力。现在提上议程的是对权力关系直接攻击、废除这一更为苛刻的解放观念。可以想象的是，革命的唯一方式不是征服权力，而是解除权力。“苏联的解体不仅意味着数百万人幻想的破灭，它还带来了革命思想的解放，来自于对征服权力的革命认同的解放。”<sup>④</sup>

霍洛威认为，权力是一个令人困惑的术语，它掩盖了一种对立，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无权者的处境。权力在两种完全不同的意义上被使用，宪定权(Power-over)与制宪权(Power-to)，这对概念也是霍洛威借用的术语。宪定权依赖于制宪权，但是制宪权现在却受制于宪定权并且反叛它，人们能够做事情的能力越来越小，而宪定权一再压抑这种制宪权的生长，使得人们的行动权力(Power-to-do)被严控在最低限度之内。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制宪权也可能充满希望，充满生长的可能性，一种自我感觉的美好便可以催生出这种希望。诸如，当我们读一本好书并感到充满力量时，又如妇女运动已经给予妇女更大意义上的她们自己的尊严感。在如今的现实世界里，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权力变成它的对立面。权力不意味着有能力去做，而是无能力去做。“它不是意味着我们的主体性的表达，而是我们主体性的破坏。权力关系的存在并不意味着获得一个美好的未来(future good)”，但现实正好相反，“我们已经无能力去获得美好的未来，无能力实现我们自己的计划、我们自己的梦想。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停止计划、停止梦想，除非计划和梦想减少到与现实权力关系相匹配的程度(即使可能会实现，也通常要通过惨痛的经历)，否则他们就会遇到挫折。”<sup>⑤</sup>因而，对于没有命令他人手段的那些人来讲，权力就是失望。

作为宪定权方式存在的制宪权意味着大多数的行动者被颠倒为被动的去做(Done-to)，人们的行为变成了被动的，他们的主体性变成了客体性。霍洛威进一步认为，今天两者的颠倒还进一步表现为，制宪权本应该是一种联合(Uniting)，一个促进我的实践和他人的实践的共有的事情。宪定权则不同，它的行使是一种分离，它将现实与概念、行动与行动结果、一人的行动与他人的行动、主体和客体分离开来，因而，这种权力本身就是使人的生命及其存在关系断裂的分离器(Separators)，宪定权更是行为的社会关系循环的破裂。“施加权力于那些行动者的人，否定了他人的主体性，否定了他们在行为循环上的地位，将他们排除在历史之外。‘宪定权’打破了互相承认，支配别人的权力不被认可，行为者的行动没有得到社会的认同，我们和我们的行动被视而不见，历史成为有权者的历史”，由此，“行为的循环成为了一种对抗的过程，即多数人的行为是被否定的，其中大多数人的行为被少数人所占有，行为的循环成为

① HOLLOWAY J. Change the World without Taking Power. London: Pluto Press, 2010: 10.

② HOLLOWAY J. Change the World without Taking Power. London: Pluto Press, 2010: 19.

③ HOLLOWAY J. Change the World without Taking Power. London: Pluto Press, 2010: 19.

④ HOLLOWAY J. Change the World without Taking Power. London: Pluto Press, 2010: 20.

⑤ HOLLOWAY J. Change the World without Taking Power. London: Pluto Press, 2010: 29.

一个破碎的过程了”<sup>①</sup>。

那么,制宪权颠倒成宪定权总是涉及行动循环的断裂或者说分离。不过,与以往社会相比,资本主义社会比先前任何社会的断裂程度都要高很多,这种断裂已经成为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建构的基本原则。作为“行果”的财产权正是命令他人行动的权力轴心,而这又以将行动循环的破裂置于社会关系各个层面的中心为条件<sup>②</sup>。这一点,霍洛威毫无疑问是严格按照马克思思想观念推演而来的。霍洛威更有价值的观念在于,他针对这种断裂重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念,认为需要借助的呐喊就是将制宪权从宪定权中解放出来,将行为从劳动中解放出来,更关键的是要看到“这种斗争不是一个权力反对权力的事情”,或者说,“这不是一个对称的斗争”。将制宪权从宪定权中解放出来是重新肯定行为的社会循环,反抗它的碎片化和否定,这就需要我们一方面基于整个社会行为的参与者相互承认,并在此基础上重新编织我们的生活,另一方面,加强对行为断裂的否定<sup>③</sup>。从这里,我们很容易看到霍洛威所谓的“革命”理念,不是一个旨在反对政权的斗争,而“反权力”才是革命的真正内涵,因为,权力就是人的生命行动断裂的原因。

### 三、“自我解放”无法抵挡资本的再次收编:一个批判

沉浸在霍洛威重新构造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念中,会时常给人一种兴奋感,这是在压抑的资本逻辑抵抗中再次燃起希望的感觉。当资本逻辑抵抗被完全认定为只有财产权颠覆这一条劳工运动的途径时,加之现实的处境给人们太多的惆怅、悲愤甚至绝望。但是,如果将资本逻辑的“抽象劳动抵抗资本”再向其前提推进到“行为抵抗抽象劳动时”,似乎一下子使得这种绝望重新有了新的可能,一种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过于悲愤、非正义的世界中重新找回自我世界的可能性。但是,他的这个行为抵抗抽象劳动的革命策略在文本的论证上看似成立,但却是令人怀疑的。虽然它试图突破现有粗糙的资本逻辑批判,进而提出以行为为主线的尊严抵抗给予人们不少启发。霍洛威一再重申革命的“反权力不是反政权”,是比反政权更激进的理念,它是通过遣散宪定权来解放制宪权的斗争。“这是共产主义梦想内涵着伟大、貌似荒谬、但又必然的挑战:遣散‘宪定权’,建立一个免于权力关系的社会。这个规划远比任何一个在权力征服基础之上的革命理念更彻底,同时也更为现实。”<sup>④</sup>这种现实性更在于,反权力是一种自我解放,它“存在于日常生活的尊严中、存在于我们每时每刻的关系中,即爱、友谊、同志、共同体、合作的关系中”,虽然这些关系已经侵染了权力,但我们依然要以相互承认、承认对方的尊严为基础来行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应该遵循的是,“有尊严地做事”<sup>⑤</sup>。霍洛威的自我解放(Self Emancipation)系统论述一经抛出,在西方学术界就引起诸多学者讨论,除了柯林尼可斯、齐泽克等与其在世界社会论坛上的争论之外,也得到了哈特、奈格里等人的大量征引。另外,2012年《古典社会学杂志》(Journal of Classical Sociology)还刊载了一期讨论霍洛威的专题,分别吸引了马歇尔·斯图扎勒(Marcel Stoetzler)、辛西娅·库克本(Cynthia Cockburn)、卡文·杨(Kevin Young)和米歇尔·施瓦茨(Michael Schwartz)、约翰·弗兰(John Foran)、卡尔·瑞德(Karl Reitter)、克里斯汀·加兰德(Christian Garland)、塞尔吉奥·阿奎罗(Sergio Tischler)、西门·苏森(Simon Susen)等一大批学者撰文批评霍洛威。“我们能够无须夺权改变世界吗?”如今已经在西方激进左翼学术界引发了更多的讨论。但是,这种路径真的能够撼动现有“资本-劳动”之间的对立结构吗?或者说它真的构想了一条崭新可靠的解放道路?实质上,就连霍洛威自己在与柯林尼可斯的对话中都表现出对未来的不确定。现在我们试图对霍洛威的观点作一点评析,以更清楚地把握其理论实质。

第一,“自我解放”的反资本主义策略将不可能迎来自我确定的社会或共产主义社会,相反,它将迎

① HOLLOWAY J. Change the World without Taking Power. London:Plutopress,2010:29-30.

② HOLLOWAY J. Change the World without Taking Power. London:Plutopress,2010:32.

③ HOLLOWAY J. Change the World without Taking Power. London:Plutopress,2010:36.

④ HOLLOWAY J. Change the World without Taking Power. London:Plutopress,2010:37.

⑤ HOLLOWAY J. Change the World without Taking Power. London:Plutopress,2010:159.

来一个比资本主义更糟糕的社会。资本主义的危机其实来自生产方式的对立性质及其包含的生产界限，“它总是力图超出这些界限，由此就产生危机，生产过剩等等”<sup>①</sup>。化解资本主义危机不可能依靠普通大众对物质欲望的节制，更不可能依靠资本家禁欲来完成。这一点马克思有过阐述，“资本家的一切行动只是那个通过他才有了意志和意识的资本的职能而论，他的私人消费，对他来说也就成了对他的资本积累的掠夺”<sup>②</sup>。所以霍洛威的方案只是一种建立在并不终结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的，以人的尊严为借口的一种犬儒式的逃避。况且资本主义的终结并不能因为我们每个人对尊严的守护而自动走进历史陈列馆。诚如马歇尔·斯图扎勒看到的，这种革命的方式并非必然终结资本主义，它不会像癌症那样，在资本主义的间隙内部不断生长，和平到达共产主义。这一点上，笔者同意他如下结论，“我认为，资本主义将灭亡是因为资本主义的腐朽，而不是共产主义的生长”，故而，“反资本主义的呐喊与裂缝都不是根本，这不可能形成共产主义”<sup>③</sup>。我们从本文的整体分析可以看到，霍洛威选择呐喊以生产或增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裂缝”，虽然可能有助于削弱资本主义对人的生命危害，但它们并非是革命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即创造或者构想共产主义的意义上，这种革命理念当然也具有一定程度上反抗的意义。因而，霍洛威的理论内部存在着一种悖论，一方面呐喊吁求共产主义（普遍的人的解放）的出现，一方面又不能找到资本主义危机的真正本质，无法找到资本主义灭亡的出口。由此，客观地讲，霍洛威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念的重构与其说是革命的，毋宁说是一种退步。所以，马歇尔·斯图扎勒才建议霍洛威必须区分否定资本主义的两个向度，革命既是终结资本主义，又是共产主义的来临，以保持两者同步推进<sup>④</sup>。霍洛威对此回应也基本是无力的，“我所认为的反资本主义指的不仅仅是反对资本，而且直接指向作为社会关系的资本断裂运动。由于我们生活在一定的无法脱离的社会关系之中，因此，在资本的断裂之后，我们需要建构一种不同的社会性”<sup>⑤</sup>。实质上，对于每个普通人来讲，对资本社会中断裂的各种社会关系，人们根本无法拒绝，只能顺从，这不是人是否高尚的问题，而是人的物质生产已经被强大的剩余价值生产给吸纳了。

**第二，表面上的激进，实质上遣散了左派的力量，走向一种新无政府主义。**霍洛威主张将拒绝呐喊的力量汇聚起来，组织并构成反权力的力量，实质上是一条消解革命主体的思路。毫无疑问，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也好，左派力量的生长也罢，最为艰难的任务便是革命的主体成为了问题。原先阶级概念在现有语境下已失去理论力量，激进左翼在各种边缘群体之间试图寻求主体，例如拉克劳、墨菲、齐泽克、巴丢、朗西埃等学者无不对此进行过理论构造，但是，革命主体依然停留在键盘敲击的文稿上。这表明激进的左派政治理论除了文稿上的姿态，在现实上终究无所成事。霍洛威在构想马克思主义革命理念的过程中，革命主体的问题显然会摆在他面前。不过他的理论构思更多来自墨西哥的蒙面人运动，即萨帕塔起义（zapatista），这种运动并非主体的直接呈现，而是主体通过蒙面来使得自身模糊化。这与吁求构造主体的革命理念完全不同，他将革命的主体力量最终分解为一个个独立的个体自我，这个自我在自己行为或组织抵抗中被抽象劳动化。显然，“霍洛威的立场遣散了左派力量，并且，它说服普遍人能够自由决定、避免国家权力并抛弃它”。这也不是说国家权力完全没有正面的价值，例如霍洛威对这一点作过如下陈述，“如果我想去帮助穷人创造一个更正义的社会，那么国家可能是一个合宜的组织形式，即它是根据人们的利益得以运行的，像古巴、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等国在很多方面所取得的卓越成就那样。然而，即使我们将视域局限于公正，我们也必须牢记：只要资本积累还存在一天，那么国家仍旧为资本积累创造条件，不管该国家建构的社会有多公正”<sup>⑥</sup>。从这里，我们仿佛看到一位对资本逻辑批判以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 摘选//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8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387.

② 马克思. 资本论: 第1卷//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5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683.

③ Marcel Stoetzler, On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Revolution that will End Capitalism Might Fail to Usher in Communism. *Journal of Classical Sociology*, 2012. 12(2): 192.

④ Marcel Stoetzler, On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Revolution that will End Capitalism Might Fail to Usher in Communism. *Journal of Classical Sociology*, 2012. 12(2): 191.

⑤ HOLLOWAY J. Variations on Different Themes: A Response. *Journal of Classical Sociology*, 2012. 12. (2): 336.

⑥ HOLLOWAY J. Variations on Different Themes: A Response. *Journal of Classical Sociology*, 2012. 12. (2): 341.

及与剥削作斗争的马克思主义者形象,但在如何真正实现有尊严的未来社会,我们又应该将他与马克思理论十分暧昧的关系区分清楚。诸如,他认为,正义并非是当前左翼的重要问题,因为只要人类活动受货币、利益熏心,我们便将生活在永不停歇的覆灭中。阻止这种覆灭、这种持续发酵的不公和暴力的唯一方法在于颠覆制宪权与宪定权分离,将这一制宪权转变为人类活动的自我确定。如果运动是为了自我确定这样一种尊严的守护,那么,人们需要链接这一自我确定的组织形式,诸如通过议会、委员会、集会等组织形式去构成反资本主义运动传统的核心。但组织形式并不等同于国家,因为国家以其历史、语言、行为习惯等方式对我们的利益实行24小时监管<sup>①</sup>。当然,霍洛威对国家消亡的持守显然是要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之过渡的必要性。

第三,废除资本的支配地位,但又不触及对国家权力的反抗,特别是对财产权的瓦解,这种矛盾重重的革命理念不可能真正实现人的尊严,更不可能最终促成人类解放。贯穿在霍洛威思想中的一个观念是“已经没有权力中心,权力四海为家了”。这一观点在福柯之后,似乎成为激进左翼学者们毋庸置疑的共识,也是构造各种抵抗策略的基本脚手架。我们知道,福柯或激进左翼所谓的权力并非经济权力,更多的是使人服从于某种规训的“微观权力”。诚如理查德·林奇(Richard A Lynch)指认的那样,福柯已经被标识为与前现代的“统治权力”不同的“规训权力”或“生命权力”<sup>②</sup>。这一区分带来的理论后果是革命理念的重大转换,并深深影响到当代激进左翼的一大批学者,革命的方针从针对统治权力这样一种中心目标的反抗,转变为一种霍洛威这类的自治主义的抵抗,结果只能是像哈特、奈格里那样主张“出走”(exodus)以及霍洛威主张所谓自我解放,即从一种现有的权力网中逃逸出来。实质上,这丝毫不能触动人们真正从“规训权力”中走出来,只要人们行动的生产资料依旧被资本家们占有,人们终究是无法逃离社会权力网的。更根本一点讲,福柯所描述的生命权力也不过是原先统治权力的一种衍生产物,而并非是对其彻底地否定,不是说今天旧有的统治权力真正消失了,而是在以生命权力的方式上加固统治权力。遗憾的是,当人们以为生命权力是统治权力的本质,本身就是将现有历史特定阶段表现出来的权力形态看作是一切社会形态的权力属性的拜物教思维,这一思维今天在左翼学术界似乎又颇为普遍,霍洛威也依然逗留在这一拜物教的思维之中。当然,霍洛威警惕夺权必然陷入到另外一种权力压制之中的担忧并非多余,站在一个西方人的视域中来审视历史也不能说其有什么错误,但需要进一步与霍洛威划清界限的是,单就以具体行动(有用劳动)抵抗抽象劳动的方案着实不可能实现对资本主义颠覆。很简单的道理,对于普罗大众来讲,霍洛威要求的行动抵抗一刻也不能停止,因为生存的急迫要远远大于尊严本身。

#### 四、结 论

综上所述,霍洛威认为的革命或者说解放策略,显然是以消解所有的权力为方向的,这一点使他拒绝了当代激进左翼所倡导的构建同盟阵线的观念。原因在于,他始终担忧此种同盟阵线会产生出话语霸权,并用这种话语来启蒙、引导作为对象的大众。进而,革命并未走出权力的围城,这被霍洛威概括为“我们抵抗他们”的革命理念。这个“他们”则被构想为权力的化身,它可以是一个形式化的存在,诸如资本;也可以是一个肉身化的存在体,诸如某个权力集团。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中的资本逻辑批判就属于这种革命理念,将社会问题的一切归咎于资本逻辑,将资本作为“他们”。与此相反,霍洛威提出的革命理念是“我们抵抗我们”,因为我们才是世界唯一的创造者,不是资本创造了我们,而是我们在创造资本。资本之恶正是人之恶,人们应该将抵抗的对象瞄向人类本身,由此反对和超越阻碍自我决定的所有的拜物教形式,诸如代表制、抽象劳动、国家等。这种反对总是经验性的、非教义性的、抵抗任何“同一性”“制度性”的东西。“我们是资本主义危机的创造者”,这是霍洛威反复声明的核心命题。但霍洛威遗

<sup>①</sup>HOLLOWAY J. Variations on Different Themes: A Response. *Journal of Classical Sociology*, 2012, 12, (2): 342.

<sup>②</sup>LYNCH R A. Foucault's Theory of Power//Dianna Taylor. *Michel Foucault: Key Concepts*, Routledge, 2014: 13.

忘的是，作为具体历史时段中的我们在创造资本逻辑之前，资本逻辑已经作为一种“先在”的条件，铺设了我们创造活动的基本生活场景。不过，霍洛威常常在文本中警惕人们注意下面两个斗争策略，即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以及当下西方激进政治左翼学者们所鼓噪的，要通过将弱势群体联合起来以整合权力的方式对抗来自各种权力压制的新社会运动。在他看来，这两种寻求改变世界的方式还固守在“权力对抗权力”的斗争框架之内，斗争的方向依然是围绕着如何使得自己拥有权力，将人的解放希望捆绑在占有权力上。但西方 20 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告诉他，只要权力存在，最终都使得斗争违背了当初解放的目的，使得人们再一次生活在一个权力社会之中。进而，他悲愤地论证人们要中断对抗压制自身的权力，可能性只能来自于我们自身。因为，“行果”依赖于行为者本身，资本的再生产逻辑依赖于劳动者，而“宪定权”是以“制宪权”为前提条件。我们自身重新设立的革命将不再朝向任何的权力占有，而是无须掌权来推进世界的革新，抵抗者自身一开始就放弃了权力的追求，在消除权力之网中重建一个人与人之间相互承认各自尊严的世界，一个更加富有人性的世界，这种消除权力的观念落在人们各自的生活实践中，以每个人自身的生活展示出一幅未来社会的图景。虽然他对权力存在导致革命违背了解放原初意义这一看法是存在误解的，混淆了马克思主义的解放与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问题，但在一个权力过于推崇的社会中，着实应该思考在推进人的更加自由发展的过程中，如何能够解决权力的废除这一同样重要的议题，这不仅是霍洛威的希望，也是马克思人类解放理念的内在要义。

## **Towards the Self-liberation Beyond Power:**

### Reflection on Holloway's Reconstruction about Marx's Theory of Revolution

SUN Liang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Based on the division of “resistance against the capital logics” into two forms: doing against abstract labor and abstract labor against capital, Holloway criticizes the latter approach that overestimated by traditional Marxism which has led to so many difficulties of re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Holloway, it is needed to search for a dignified Interstitial Revolution in the form of doing itself coming from the abstract labor against capital. Essentially, what Holloway's theory of revolution requires is to abandon the domination of capital, but it finally does not touch on the rebellion against the state power, which seems to be a dilemma and it is difficult to bring a self-determined or communist society. It appears to be radical and demobilizes the power of the Left in fact. This leads to be a neo-anarchism.

**Key words:** Holloway; Marx; power; Interstitial Revolution

---

● 收稿日期: 2016-05-30

● 作者地址: 孙 亮,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上海, 200241。Email: sunliangbs@163.com。

● 基金项目: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016BZX005)

● 责任编辑: 涂文迁